

□经济与管理

中国石油外交模式探析

——基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思考

李 昕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石油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于国际形势、外交战略以及石油地位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石油外交路径,实现了不同的目标。我国对外石油关系深嵌于国家外交战略议事日程中,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石油外交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石油外交模式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般解释意义。

关键词: 中国石油外交; 路径选择; 外交目标

作者简介: 李昕(1970—),男,陕西汉中,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从事国际能源安全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2013)04-0036-07 **收稿日期:** 2013-04-21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之后,石油资源逐步取代煤炭,并在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分布的不平衡决定了石油的政治属性,与石油有关的问题没有国家的参与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尤其是在石油安全保障的外交领域。俄罗斯著名的能源外交问题研究专家日兹宁认为,“能源外交”是指对外政治、对外经济和能源部门为实现“对外能源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对外能源政策”就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在能源生产、运输和需求方面的民族利益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采取的行动,其目的、任务和优先地位与对外政策密切相关。^[1] 能源外交的一般定义同样适用于“石油外交”。“石油外交”在实践中表现为国家利用石油资源杠杆达成地缘经济或地缘政治目标;同样的,国家也会利用于己有利的地缘经济或地缘政治杠杆来为国家的石油安全保驾护航。“石油外交”的路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石油禀赋、国际石油地位和地缘政治经济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石油外交路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从国际关系视角看,有关中国石油外交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02年以来国际油价大幅波动时期,主要关注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与石油

安全保障有关的外交活动。这些成果表明,1993年之后中国石油外交的路径选择主要依赖日益上升的大国地位、庞大的消费需求、全面友好的对外关系等地缘政治经济比较优势来保障石油供应安全。但研究成果聚集恰恰体现了研究的不平衡和特定时期的相对缺失。改革开放前三十年(1949—1978),中国经历了从石油净进口国到净出口国的历史变迁。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是否存在石油外交活动?换言之,中国从石油净进口国向石油净出口国的历史变迁仅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还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紧密相连?如果存在,那么中国的石油外交循着怎样的路径选择来达成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目标?作者认为,对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石油外交的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二、建国至60年代初期中国的石油外交

新中国成立前,国外专家对中国石油资源的前景普遍持悲观看法,中国被定性为“贫油”(oil poor)^[2] 国家,原油地质储量估计仅为2亿吨^[3]。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根据二战后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针所要追求的外交目标是维护传统安全和恢复发展国民经

济,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借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力量。具体到石油领域,借助于中苏高层迅速确立的战略安全框架,中国获得了维护国家安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石油资源和相关技术支持。

这一阶段中国石油外交的形式主要有:

1. 直接进口石油资源。如表 1 所示,新中国成立当年就从苏联进口了超过自己产能的石油;1950—1954 年,苏联是唯一向中国出口石油的国家;1962 年之前,进口苏联石油一直维持着很高比重,绝大部分年份超过 70%。1955 年开始,中国石油进口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主要从罗马尼亚进口少量石油),但仍然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国后十年,中国一直维持着 50% 以上的进口依存度。上述进口结构特征完全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方针内涵相一致。50 年代两个石油进口高峰段:1950—1953 年和 1955—1957 年。前一段正好处在抗美援朝期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后一段处在“一五”计划

最为关键的建设时期,大量重工业设备投入运转大大增加了石油需求。这说明当时进口石油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是绝对必要的,也说明中国石油外交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追求的目标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2. 获得石油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持。从 1950 年开始,新成立的中国燃料工业部开始大量聘请苏联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华,提供从地质勘探和钻井活动,到增加油田产能和提高炼化能力,再到装备引进、发展规划和人员培训等一系列的技术支持。1950—1959 年,中国石油系统先后聘请苏联专家和技术工人达 434 人。^[4]三年恢复时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大幅度提高了玉门油矿的产能,成为五十年代中国原油产量迅速增加的关键项目。1953 年中国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在兰州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现代化炼油厂;苏联政府还派出了以特拉菲穆克院士为首的专家组来华,帮助中国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石油产业的发展蓝图。

表 1 1949—1965 年中国原油生产和进口状况(单位:百万吨)

年份	原油总产量	年增长率 (%)	总进口量	从苏联进口量	进口依存度 (%)	进口苏联石油占总进口量的比重 (%)
1949	0.12	—	0.14	0.14	53.85	100.00
1950	0.20	40.00	0.28	0.28	58.33	100.00
1951	0.31	35.48	0.73	0.73	70.19	100.00
1952	0.44	29.55	0.61	0.61	58.10	100.00
1953	0.62	29.03	0.83	0.83	57.24	100.00
1954	0.79	21.52	0.90	0.90	53.25	100.00
1955	0.97	18.56	1.87	1.59	65.85	85.02
1956	1.16	16.38	2.74	1.73	70.44	63.14
1957	1.47	21.09	2.69	1.80	64.66	66.91
1958	2.26	34.96	3.24	2.51	58.91	77.47
1959	3.70	38.92	3.93	3.05	51.51	77.61
1960	5.20	28.85	3.88	2.96	42.73	76.29
1961	5.40	3.70	3.38	2.93	38.50	86.69
1962	6.00	10.00	3.00	1.87	33.33	62.33
1963	7.00	14.29	3.01	1.41	30.10	46.84
1964	8.50	17.65	2.31	0.51	21.37	22.08
1965	10.60	19.81	1.01	0.038	8.93	3.76

数据来源: VACLAV SMIL. China's Energy: Achievements, Problems, Prospects [M].

1950—1960 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增速惊人,主要原因是中国石油技术专家和工人们自力更生的奉献精神,但苏联的援助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在苏联“五一”地震仪的帮助下,中国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石油地质储量发现,包括世界级的大庆油田。除苏联提供的援助外,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东德等国的专家,也提供了建议和帮助。

3. 主动派出考察团。1955 年 9 月,新成立的石油

工业部派遣了第一个大型石油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当时苏联年产石油 5600 万吨,已成为世界产油大国,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技术经验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代表团还与苏方商谈了聘请专家、购置勘探器材和引进炼化装备事宜。

4. 组建合资企业。1950 年 3 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双方按照平权合股原则,组成新疆石油联合股份公司,在北疆开展石油勘探开发,建设了独山子油田和炼油

厂,1955 年公司移交中国。这是新中国石油史上最早与外国合股的公司。通过组建合资企业中国学到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了新疆的石油勘探开发进程。

回顾这一时段中国的石油外交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依存度很高的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资源禀赋不足以成为中国追求外交目标的杠杆。那么中国依靠什么路径实现自己的石油外交目标?苏联为什么会大量出口石油给中国、并提供全方位的石油技术援助呢?

苏联主要从现实主义权力对比和国家外交战略目标来考量是否对华石油出口和提供技术支持。冷战开始后,两大集团的权力对比显然不利于苏联,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选择为苏联改善不利境况提供了契机。苏联高层认为,除自己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的国家,支持中国是必要的,完全合乎国际层面的权力对比和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理性计算。朝鲜一战,中国力挫超级大国的壮举使苏联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更加看重,极大地增强了苏联与美国权力博弈的分量。

以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为转折点,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58 年在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上中苏双方矛盾加深,1959 年苏联中断对华技术援助,一大批石油技术专家撤离中国,一批在建石化项目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机器设备而陷于停顿,成为 60 年代初期国内石油供应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表 1 所示,虽然苏联对华石油出口并没有立即跟进双方关系恶化而出现大幅波动,但 1963—1965 年中苏关系完全破裂的进程却清楚而逼真地从石油进口量的直线下降中显示出来。尽管有大庆油田全面开发的因素,但在正常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中,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是非常罕见的,后续发展进一步表明(中苏之间的石油贸易在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归零),中苏的石油关系深嵌于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和国家战略目标之中。

三、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中国的石油外交

60 年代苏联迅速上升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又一

重大威胁。为了应对美苏“两超”的巨大压力,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并主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国家),谋求建立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中国把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作为外交重点,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上述外交方针政策在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的对外石油关系中得到体现。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后,两国高层确立的同盟制度形同虚设,两国从各自的安全战略设计和国家利益出发改变了对彼此的认知,反映在中苏间的石油关系领域,中国不再认为从苏联进口石油和引进相关技术设备能达成石油外交的战略目标,苏联也不再认为发展同中国的石油关系可以增强在美苏权力争夺中的地位,甚至视中国为通向霸权之路的重大威胁。

苏联突然从中国石油部门撤走专家,给这一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和损失,中国高层透过这一事件初步认识到石油安全的战略内涵,号召加倍努力实现石油的自给自足,将“自力更生”作为中国能源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可以称之为“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的能源安全观”,即政府完全控制国内的能源体系,在国外有能力保持战略主动性。但“自力更生”并非完全自我封闭,这一时期中国继续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进口石油产品,1965 年中国从罗马尼亚进口的石油产品达 10 万吨。此外,中国还从第三世界的伊朗和埃及等中东国家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据统计,1960—1974 年间,大约有 200 万吨的原油和石油产品从中东进口。

如表 2 所示,在 1965—1972 年间,随着三大油田的陆续投产,中国原油产量继续高速增长,但大部分时间中国依然是石油净进口国。1964 年,中国开始出口原油和石油产品,这一时期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朝鲜和越南。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进出口量都非常少,不足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中国发展对外石油关系的动机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和战略性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收益主要是维护国家安全,抵制霸权主义的威胁。

表 2 1965—1973 年中国原油生产和石油进出口状况(单位:百万吨)

年份	原油总产量	年增长率(%)	石油总进口量	石油总出口量
1965	10.60	19.81	1.01	0.23
1966	13.00	18.46	0.48	0.37
1967	14.90	12.75	0.19	0.36
1968	16.50	9.70	0.37	0.08

续表 2

年份	原油总产量	年增长率(%)	石油总进口量	石油总出口量
1969	18.00	8.33	0.66	0.06
1970	26.40	31.82	0.66	0.09
1971	36.50	27.67	0.35	0.30
1972	42.30	13.71	0.38	0.81
1973	53.00	20.19	0.39	1.82

数据来源: VACLAV SMIL. China's Energy: Achievements, Problems, Prospects [M]; KIM WOODAR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 of China [M].

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但有两个例外,即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积极支持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在 60 年代初破裂;罗马尼亚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但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罗马尼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明确支持中国,如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围攻”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罗马尼亚不希望成为苏联霸权主义的棋子,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借助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实现这一目标是其重要的外交选择。在 60 年代初期,罗马尼亚向中国提供了石油和石油钻探设备,并派专家帮助中国发展石油工业。^[5]这一时期,罗马尼亚代替苏联,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在中苏关系完全破裂的情况下,保持同东欧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助于缓解苏联压力,摆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孤立境地。中国从 50 年代起就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60 年代大幅度增加了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对阿的国民经济发展、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至关重要。

朝鲜和越南是中国的两个邻国,在历史和地缘上与中国有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又因美国发动的两场侵略战争而提升到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生死存亡影响的高度。支持朝鲜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存在和独立、援助越南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抵抗美国霸权主义扩张是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外交战略目标,向两国提供保障安全最低限度的石油供应符合中国的外交目标。这一时期,中国石

油外交的基本路径选择是,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指导下,既借助于中国在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独特国际地位,也借助于中国逐渐增强的石油资源地位;既运用国际政治地位维护石油安全利益,也运用日渐增强的石油供应者的地位,实现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路径选择具有双向性特征,具有向 70 年代初期后出口国地位过渡的趋势。

四、70 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中国的石油外交

进入 7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 年 10 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拉开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序幕;同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全面解冻。中国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认识到苏联是中国安全的最主要威胁。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思想,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外交资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一时期,中国石油外交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上述外交战略目标。

如表 3 所示,中国从 1972 年开始成为石油净出口国,随着原油产量的提高,出口量迅速增加,尤其在 1973—1975 年里,出口量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中国石油地位的变迁在 70 年代的国际关系领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表 3 1972—1978 年中国原油生产和进出口对比(单位:百万吨)

年份	原油产量	总出口量	总进口量	净出口量	出口占原油总产量的比重(%)
1972	42.30	0.81	0.65	0.16	1.86
1973	53.00	1.82	0.14	1.68	3.43
1974	63.60	5.18	0.11	5.07	8.14
1975	74.26	10.58	0.20	10.38	14.25
1976	83.61	9.30	0.20	9.10	11.12
1977	90.30	10.69	0.30	10.39	11.84
1978	104.05	11.33	0.001	11.33	10.89

资料来源: KIM WOODAR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 of China [M]; VACLAV SMIL. China's Energy: Achievements, Problems, Prospects [M].

首先,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成为石油输出国的地位。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很少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能源生产体系所隐含的国际意义,国际能源专家几乎不关注这样的可能性:中国将会变成工业大国需加以正视的“能源巨人”(energy giant),直到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受到危机打击的国家纷纷寻找波斯湾石油的替代进口地,就在这一年,中国大幅增加原油出口量。由于当时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石油产业发展情况不了解,一些观察家做出过分乐观的预测,认为中国可能会变成石油市场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将是未来的沙特阿拉伯,不久中国将会超过美苏而成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6]

最先关注中国石油情况的国家是地缘接近和能源贫乏的日本。1972年访日的日本贸易代表团被中国大量有关原油生产的报道所吸引。1973年初,当中国向日本出口第一批20万吨的低硫原油时,日本朝野上下高度关注,东京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报道此事。日本政府和产业界立即表达了他们的期待,希望中国大幅增加对日本的原油出口。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日本对进口中国原油的期望倍增,甚至提出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中国在1975年向日本出口1400万吨的原油。

其次,当西方工业国家遭受石油危机打击时,正好是这些国家与中国政治关系改善的时期,对中国石油出口前景的乐观预期增强了美日等国与中国在石油勘探、开采、运输和炼化领域的合作愿望。1973年1月日本代表团就提出联合勘探海洋石油的建议;1973年春季广州交易会期间,美国几家大的石油公司和设备生产商就表示愿意参与中国海洋石油资源勘探开发,认为中国会积极考虑美国的愿望,中美具有“巨大的易货贸易前景,即利用美国的专门技术交换中国的石油,而当时美国正在寻求减少对阿拉伯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7]。在石油危机期间,美日两国在希望参与勘探开发中国海洋石油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日本还参与了关于修建从大庆到大连石油管道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便增加大庆原油的出口运输量。

最后,与前两个阶段不同,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石油地位的改变,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改变的乐观认知,中国石油外交的运作空间大大拓展了。中国利用自己迅速改善的石油地位,既同发达的工业国家进行石油合作,也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石油资源;既赚取了当时紧缺的外汇,获得了重要技术设备和紧缺的工业原料和产品,又扩大了与国际社会

的接触面,摆脱了相对孤立的境地,改善了周边环境,获得了政治安全上的收益。在“文革”年代,与其他外交领域相比,中国的石油外交出现了少有的左右逢源态势。

出口石油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石油外交最主要的形式,出口石油的目的地不同,出口石油所要实现的外交目标也不同。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提出进口中国原油的愿望,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1973年初,中国开始向日本出口第一批原油,随后逐年增加。中国出口原油的绝大部分都是面向日本的。以1972—1975年为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原油占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24.69%、54.95%、92.80%和73.72%^①向日本出口石油实现的目标有:以“合理高价”赚取必要的外汇。1973年向日本出口100万吨原油的协议价格为每桶3.8美元,高于沙特原油标价(1973年1月1日为2.591美元),也高于类似品质的印尼米纳斯原油价格(每桶2.96美元)。石油危机爆发后,油价暴涨,1974年1月中日达成的第一份石油协议规定出口日本的油价为每桶14.80美元(同期沙特原油标价为11.651美元);同年第二份石油协议每桶降至12.85美元,但仍高于同期同质的印尼米纳斯油价(每桶12.60美元)。“合理高价”是石油输出国维护本国石油利益通行的做法,价格一般不会高到进口国无法承受的地步。日本接受协议价格显然经过了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溢价的理性计算,进口中国原油的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远比当时的中东要低。

其他目标:交换先进设备和工艺技术、以及紧缺的工业材料和产品。例如,1974年中日展开的石油贸易谈判涉及用原油交换日本合成树脂和合成纤维。

这一时段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采取的是政府间协议的形式,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巧妙地运用了石油外交。1973年中国的原油产量超过5000万吨(表3),这一重要信息使日本对进口中国原油的期望值很高。日本政府和产业界非常希望同中国签订一份长期供油协议,这样的协议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可以稳定价格,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避政治风险。但中国需要根据国内生产和需求情况,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灵活地做出调整,不愿意受到长期协议的束缚,但维持中日石油贸易关系又是必要的。因此,中国既没有接受日本的要求,

^①根据上述表格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也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期望,而是采取逐年谈判的形式,逐步扩大对日出口量,使日本对增加中国石油进口总是存在一定的预期。这样中国就很好地掌握了主动权,实现石油外交目标。

70年代中国进行的最为成功的石油外交活动是借助于中日之间的原油出口协议谈判来影响日苏之间的能源合作议程。20世纪70年代,苏联利用其在远东的资源优势诱惑日本投资开发该地区。最重要的投资谈判是日苏关于秋明油田开发和跨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建设项目,拟议中的管道全长4000多公里,包括管道沿线的公路建设计划,这些项目投资预算至少在32亿美元。^[8]这项谈判议程引起中国的强烈关注,中国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投资这项计划。很明显,一旦协议达成,将会大大增强苏联远东地区的工业经济实力和军事行动能力,跨西伯利亚管道和公路计划靠近中苏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而且接近中国最主要的大庆石油生产基地,这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东北能源基础设施有面临苏联攻击的危险。通过逐年谈判石油出口协议的方式扩大对日的石油出口,中国培养了日本持续进口中国石油的偏好和预期,最终日本放弃了秋明油田开发和跨西伯利亚管道项目的投资谈判。

在选择出口国家时,中国也不是随意而为的,除日美等工业大国之外,中国也扩大了同泰国、菲律宾等国的石油贸易。1974年1月中泰(国)达成石油易货协议,中国用7.5万吨柴油交换泰国的橡胶和苎麻;同年,经过谈判中国和菲律宾签订了向菲律宾出口100万吨原油的协议。中国出口给菲律宾和泰国的原油及其产品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被称为“友谊价格”(friendship price)。当时中国正积极拓展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中国提供的石油缓解了这些国家的困境,也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1975年,中国先后与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中国石油外交非常成功,实现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外交目标。在“文革”年代,中国石油外交是极具特色的亮点。这一时段

中国石油外交的路径选择是:依靠迅速增加的石油产量,从充满困境的石油净进口国转变为充满希望的石油净出口国,中国利用这种地位展开了巧妙的石油外交,实现了维护国民经济运转和国家安全保障的外交目标。

五、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对外石油关系的分段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的对外石油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无涉政治安全的经济和技术关系,而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对外石油关系深嵌于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议事日程中,两者在三个时段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甚至互为表里。即使在对外石油关系大为压缩的60年代,对外石油关系的外交属性和政治价值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恰恰在这一时段,非常有限的对外石油关系折射出了强烈的国家安全诉求。因此,中国的石油外交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不仅存在,而且因为受制于冷战的国际环境,表现得更为直接,鲜有事例说明对外石油关系曾获得“中立”的地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石油外交的路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须结合具体的国内外环境、外交战略变迁、地缘政治态势和石油地位等综合因素来思考其中的变量关系(表4)。

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石油外交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解释意义。在今天的国际石油环境中,一国的路径选择最终是由该国可资利用的优势地位决定的。一般来说,资源丰富的石油输出国借助于国际石油地位不仅要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会不失时机地追求外交战略目标,实现石油收益的最大化;石油资源不足的净进口国会利用地缘政治或经济地位来保障本国进口石油的安全供应,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具备双向选择的战略实力。美国既可借助强大的综合实力保障本国进口石油的安全,也可借助美元在石油交易中的地位、成熟的战略储备体系和庞大的市场需求,来掌控国际石油定价权,实现美国的外交战略目标。

表4 改革开放前中国石油外交路径选择

时 段	国际环境	外交方针和目标	石油地位	比较优势	石油外交路径	石油外交目标
建国至60年代初	两大阵营对抗、中苏结盟	“一边倒”、传统国家安全	依赖进口石油和相关技术	制度选择、地缘政治地位	地缘政治地位→石油进口和技术支持 地位↔石油进出口	恢复发展经济、保障国家安全

续表 4

时 段	国际环境	外交方针和目标	石油地位	比较优势	石油外交路径	石油外交目标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	美苏争霸、中苏关系破裂	联合“第一中间地带”反两霸、国家安全	基本自给自足、少量进出口	反“两霸”的战略地位、石油出口		维护国家安全、抵制霸权主义
70 年代初至改革开放	美苏争霸、苏联威胁、中西缓和、石油危机	“一条线”、维护周边安全	产量大幅增加、净出口国地位	迅速扩大的石油出口	石油出口地位 → 改善周边环境	外汇收入、拓展国际空间、改善周边环境

社, 2004.

[参考文献]

- [1] 日兹宁. 俄罗斯能源外交 [M]. 王海运, 石泽,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 Kim Woodar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 of China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 Vaclav Smil. China's Energy: Achievements, Problems, Prospects [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6.
- [4] 温厚文. 百年石油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 [5] 李峰.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 [6] Robert. Ebel. China's Energy Future: The Middle Kingdom Seeks Its Place in the Sun [M]. Washington, D. C: The CSIS Press, 2005.
- [7] R. Koven. U. S. Firms, China Weigh Oil Deals [N].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73, pp. A1, 24.
- [8] K. Nakamura. A Rethink in Japan [J]. FEER 87, 1975, 31(2): 62-63.

[责任编辑: 李 伟]

On the Pattern of China's Oil Diplomacy ——Thoughts o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Xin

(Law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Law, Anhui,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oil diplomacy had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choosing different paths to achieve different goal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status of petroleum. China's foreign oil diplomacy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whole country's foreign relations strategy agenda, and both are internally consistent. Oil diplomacy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pl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 as a whole. A general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attern of China's oil diplomacy is of explain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hina's oil diplomacy; path selection; diplomatic goals